



今年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作为一个在中国话剧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剧院，北京人艺演剧艺术发展中的诸多成功经验应该成为中国话剧创作的宝贵财富。为此，本报将陆续在相关栏目刊登回顾人艺经典剧目创作历程、解析人艺创作理念、重温老艺术家创作、演艺之路的文章和记者专访，以探讨北京人艺风格的内涵和形成过程，推动中国话剧的繁荣发展。

——编者

■ 关注

剧院要有活在观众心里的好戏

是开放的，是向观众不断敞开的，其内涵和舞台形象是面向未来的，可以不断阐释。我不太赞成原封不动的排演经典剧作，最好能给今天的观众带来新的观剧体验。经典剧目要获得持久的生命力，最重要的就是要随着时代、语境的变化而变化，要面向社会现实和文化生态，了解今天人们的价值追求、道德情怀。3月底人艺将推出《推销员之死》，这部戏在1983年曾经和中国观众见面，由于当时我们是计划经济时代，演员们甚至都不了解推销员到底是干吗的。而今天，我们再来演新版本就一定会和以前大为不同，这种创新是必要的。

解玺璋：事实上，60年来北京人艺的现实主义传统一直在变化、发展，并日益丰富多样。但如何认识、继承和发展这份宝贵遗产，也一直存在争论和分歧，我觉得这也正是北京人艺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之一。至少有两种态度是不可取的，一种是轻视这份遗产，错误地认为它已经过时了，不能满足当前戏剧发展的需要了，不舍得花力气去了解、研究它，使它为今天所用；另一种是把这份遗产奉为神明和教条，什么都要追求“原汁原味”，一点都不可能走样，跟在前人身后亦步亦趋。这两种态度貌似两个极端，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其实他们在思想方法上倒是殊途同归，或者说，都带有形而上学的偏颇。

记 者：“创新”不是刻意求变、求怪，北京人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剧院，该如何在继承经典与谋求创新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杨乾武：经典作品当然可以重新阐释，重新演绎能让今天的观众懂得什么是真正优秀的文化遗产，这样他们在泥沙俱下的市场中才不会无所适从。经典剧目是根基，创新不是凭空从虚无中产生的，两者要互相参照、刺激、生长。

剧院在创新中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在大剧场投入太大就面临很大的市场风险。步子可以迈得小一点、稳一点，先尝试在小剧场创新，观众认可后再到大剧场演出，这样就可以用小剧场的创新为大剧场输血。在美国百老汇和英国伦敦西区，大剧场不断演出经典剧目，而周边的一大批小剧场则进行着各种实验和探索，大小之间有良好的互动，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解玺璋：人艺传统剧目的创新，在导演方面主要是林兆华和李六乙，在剧作方面则表现为引进外的剧作家，比如托生·莫言·徐瑛等，他们将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的东西带到现实主义的传统之中，丰富了现实主义传统的表现力，对现实主义传统是一种发展。

对人艺这块老品牌来说，创新是使它保持活力的唯一方式。林兆华近年来努力将传统戏曲的表现手段乃至艺术精神引进到话剧创作中，也是很有意义的。这种创新也正是焦菊隐艺术遗产中的一部分。

记 者：在北京人艺的官方网站上介绍了纪念建院60周年的四大版块活动，其中有句话说“人艺的一系列原创作品被评价为‘不是经典，就是走在通往经典的路上’。”我们当然希望这是事实，但客观来说这些原创剧目真的走在这条路上了吗？

杨乾武：北京人艺每年都会推出几个原创剧目，今年也是如此，但因为剧本难度较大所以仍在打磨。这些原创能不能成为经典，不是谁说“可以”就真的可以的，而是需要时间的检验。一部话剧要成为经典，关键是一度创作，要有好的文学剧本。有了能立得住的人物和故事，即使初排不尽如人意，后人总还可以不断进行二度创作。人艺原创的《知己》就有成为经典的可能，因为它有一个好剧本。但目前，话剧舞台上能让观众觉得眼前一亮的精品似乎不多。

解玺璋：当下的对话剧究竟如何？真是一言难尽。爱它恨它，赞它骂它，都可以找到充分的根据和理由。向经典看齐，是很有必要也很伟大的志向。事实上，缺少原创剧目、原创剧目品质有待提高，是包括人艺在内的所有剧院都该面对、解决的问题。

我认为，经典只是一个标杆，悬置在那里，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这个目标主要是艺术和审美的，没有高低远近的问题。今天的一些作品过若干年也许会成为经典，但用当下进行时的作品和经典比较，不太合适。（李晓晨）